



卢云龙

第二节 安康散文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

安康,安宁康泰之意,一个多么吉祥的词汇!我们应当感谢第一次用这个词为这方天地造名的先辈,准确表达了人们最美好的祝愿。

安康地处我国南北交界之地,一条汉水穿境而过,北属秦岭余脉,南归巴山副脊。用著名作家王若冰的话说,历史上第一个为汉江命名并确认汉江在中国江河湖海中无可替代地位的历史名人,大概应首推战国时期大思想家、儒家学说的最重要的继承者孟子。(见《走进汉江》太白文艺出版社,2022.6)其风物地貌、人情民俗皆呈南北交融、兼收并蓄之态,是对关中以故化为主的的人文景观,陕北以黄土风情为主的自然景观的有益补充。这里山清水秀,桑田阡陌,白鹭翱翔,翠竹林立,点点村居,袅袅炊烟,乃至一条穿城而过的汉江,秦巴群峰各异的山势风姿,临水而居的安康古城,以及民风淳朴敦厚得山水滋润聪慧而生的安康人民,皆可使众多的散文写作者流连忘返,如痴如醉,笔下生花,美文迭出。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果仔细梳理不难发现,安康历代散文作品中,作者之人,文中记事,所述范围,无不烙上了历史的印痕。如此,散文史就不单是对散文发展脉络的勾勒,也是对作家心性的捕捉与感悟。这就要求撰写者要用史识来统驭史料,寻找历史时代的政治、文化背景的再现;从审美高度对作家的天性、身世、学养等因素深入肌理的评述,判定作家及其作品的文学史地位,表达对散文发展的见解,深入细致地探讨历代散文发展及其特征形成的原因,从而揭示历史、现实之间的联系、的哲学意蕴,还有人生世态的展示。

当然,还有更加重要的一点就是回到历史,用动态的史识探索散文发展的自在轨迹。就是将散文的发展放置在历史文化环境中考察,不仅要还原历史,也要寻找到契合于历史现实散文的发展动态,以及各个时期散文现象的生成原因,形成一个相对完整而合理的结构和清晰绵密的脉络,从而揭示散文发展思潮的自在轨迹。尽管,撰者只是想探究安康这一方地域性的散文发展的自在轨迹。

我们说,论文学则必先考察历史。历史是云雨,文学则是雨后彩虹;历史是长河,文学则是飞溅的浪花。文学伴随人类文明而产生、而发展——这是笔者的文学老师丁文先生在其所著《安康文学史话》中的开场白。

的确,安康的文学必附丽于安康的文明发展进程。众所周知,汉水流域是人类文明较早的地区之一。现有资料证明,当汉水形成七亿年之后,长江和黄河才逐渐形成。《说文解字》中的金文里的“汉”字为上下结构,上面为繁体的“难”字,下面则是“水”的象形字,古人解释为流放的水域,即古代专门流放政治犯的地方。安康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原始先民在此缘水而居,繁衍生息。

历史悠久的安康,夏商周时期为蛮夷之地,部落、方国林立,夏属梁州;商周之际,是巴、蜀及庸的封地;在以后的发展中,这些群夷之国的灭亡,有的迁徙,融合于中华民族的更迭变化之中。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秦统一六国,实行郡县制,划汉江中上游为汉中郡,辖十二县,其中在今安康境设有西城、旬阳、安阳、锡阳县。西晋太康元年(280)取“安宁康泰、万年丰乐”之意,将安阳县更名为安康。后设晋昌郡、上庸郡、西城郡等。唐、宋、元、明时期为金州。万历十一年(1583)改金州为兴安州。乾隆四十七年(1782)兴安州升为兴安府。

这样的历史背景,对安康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必然影响深远。

一是厚植了地方文化的根基,产生了源于汉江沃土的汉水流域文化,拥有23391平方公里土地和300万人口的安康又在汉水流域文化中占据主体位置。(当然,古时候的安康人口远没有现今之多)

二是东汉末年以后至隋统一之前的三百余年间,全国进入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分裂时期,而安康一带虽然处于南北政权交界与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居的地区,但无乱魏蜀之间、两晋与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南朝与北朝之间,均未在此地进行较大的战争,社会相对比较安定。全国性的持久战乱,在这个被称为我国古代南北文化交叉地带所产生的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倒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安康的社会发展,特别是和相邻的秦陇、巴蜀、荆襄三个文化区相互渗透。

三是自明代中期,安康地区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

的经济开发,社会生产发展了,文化也随之发展了。明成化十二年(1476),鄧阳巡抚、左副御史原杰继白圭、项忠平定荆襄流民起义后,倡议大开山禁,欢迎流民附籍。于是数以万计的流民拥入安康,到处垦殖。流民带来了大批劳动力和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有力地促进了安康的经济开发和文化发展。

由此影响所及,活跃在安康古代文坛的作家大体由四部分组成:一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本籍人,如张补山、董诏;二是移民的后代,如刘卿、刘宇,由山东迁来的;三是因封建皇帝封官实行“回避政策”而派来安康做官的文人学士,如姚合、叶世倬、严如煜;四是流寓之人,如居安40年的高寄系江苏武进人。笔者将在以后的章节中逐一进行评价。

时光到了唐代,不论是出生在今安康的怀让禅宗也好,还是客居安康、路过安康、文涉安康的孟浩然、杜甫、杜牧、白居易、皇甫曾、吕洞宾、姚合、无可、周贺、方干等等,留下的都只是诗歌。而散文类则是元和初任浔阳主簿的刘肃所著《大唐新语》13卷中,记载唐初至大历末年士大夫的政治生活,著作活动中有一篇描写李袭誉的文章。这李袭誉为古金州人、李袭志之弟,为官军府司马,唐高祖时召授太尉少卿,安康郡公,此后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江南巡察大使。为政以农为本,劝民重农桑,亲自主持引雷放水,筑句城塘,灌田八百顷。著《五经妙言》40卷,《江东记》30卷,《忠孝图》20卷。刘肃在《大唐新语·卷之三·清廉第六》一文中,描写了李袭誉这一以农为本的举动。

安康宋元时期的散文传世不多,但品类还丰富,有议、序、跋、记、考、说、感、言、赋等杂记类的叙事写景散文、碑志等,还涉及佛门禅宗。以北宋著名文学家陈师道寓籍安康作《忘归亭记》,元代“金州训导黄理仙作”《重修忠惠王庙记》,元代金州知州郑均作《金州重修文庙记》等文被清陕西巡抚毕沅选编入《灵岩山人文集》中。

明朝,安康散文创作者主要有兴安进士刘文翰、王应泰等,皆写下了许多反映安康风物人情的好作品。其中有《新复县治记》《新修遗祠》《骆驼岭关帝庙记》等,还有邑人王养民、华宗元、沈本学、梁应乾等人,他们留下了《莲花寺碑》《古洞源记》等清新喜人的佳作。同时,明代还开创了安康游记散文的先河,著名的有刘阁的《游香溪山水记》、徐远逊的《神滩游记》、蒋嵩的《灵芝亭记》等;还有不少写人记事的散文佳作百余篇,如汉中太守项思敬的《善人桥记》、兴安州守许尔忠的《虞帝庙记》等。

清代是我国文化集大成的历史时期,安康文学亦进入辉煌时期,到达新的高度。以刘应秋、李松、董诏、王玉澍、张鹏飞、雷钟德为中坚的本籍作家和以李翔凤、王希舜、叶世倬、王森文、陈仪、林阳光为主力的客籍作家,联袂作战,把安康文坛开辟得红红火火。安康清代作家张扬起现实主义文学的大旗,写下了许多现实主义佳作,叶世倬、张鹏飞等人更力主治世文学,使其作品更具封建政治色彩。受乾嘉学派影响,董诏、王玉澍等人颇重经学。王玉澍的《经史杂志》是这方面的力作。在造就作家方面,董、张二位贡献卓著,他们执教兴文,作家间多是师承关系,而非家学渊源,所以这批作家有较高的文学素养,董、王二位就是贯通经史的文者。董诏的文学传人王有玉、王澍、茹金、张鹏飞、谢玉珩、马二南等;张鹏飞门下受业弟子有雷钟德、武廷珍、管涛、吴敦品、黄加焜、李芬等。正是通过一传二传三传,桃李满秦巴,推动了安康文学事业的大发展。

清代,更是安康散文大发展的时期。刘应秋《一砚斋》收录散文59篇,赋4篇,与刘应秋同时活跃在安康文坛上的还有兴安知府王希舜及李筠庵、鲁仁新、许又衡、许又峰、钟仪奇、钟仪杰等散文能手。他们留下的《汉阴地土辨》《刘瑞云》《汉阴近代盛衰始末》《建设七里关路碑记》等散文具有较高的艺术造诣和史料价值。另外,清代安康文坛客籍的地方官吏如黎阳令张志超、平利令古津及石岩、沔阳令邓梦琴、宁陕总兵黄芳、安康知县陈仪、汉阴通判钱鹤年、兴安知府叶世倬等都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佳作。到清代中晚期,董诏、张补山、朱元勋等人所留下的散文《正谊堂文集》《游万春寺》《平匪十策》《守城纪略》等,都纯正不矜,沉实恢宏……

1949年牛蹄岭战斗的炮声宣告了安康的解放,绵延2000余年的旧时代的安康文学便也宣布结束。安康文学史将掀开新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的鼓鼓敲响了新时代的主旋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安康散文注入了活力,迎来了百花盛开、春色满园的喜人局面。文学艺术不再只是,迎来了,而是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给安康文苑带来勃勃生机,安康的业余作者数以千计地发展壮大,一批俊才脱颖而出,其中散文在各种文学种类中果实最为丰硕。

第三节 安康散文的种类与发展轨迹

文字符号自创造之始,其自然而不规则的组合便呈现为一种散文形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也是中国散文史。其他文体都是从散文中分离出来的,

一切文本都无不有散文的胎记。从夏商周三代的文本混沌,到汉魏六朝的文本自觉,再到唐宋八大家从正面的登峰造极,直到明清前后白学、公安派、竟陵派、桐城派从各个侧面的添富加华,以及五四新文化兴起的白话文运动。散文的发展是题材和体裁减少的减少,增加的增加。减少的要么自成一家,要么转化进入别的文体门类,毋庸多言。对于散文,希腊人称为“口语著述”,罗马人称为“无拘束的陈述”,都是就散文的本然状态而言的。被称为散文者,质朴而富有张力,几乎披覆了历史学、哲学、宗教学、政治学、文学的所有著作,甚至自然科学著作。

在我国,散文一词始用于宋代。宋王应麟《词学指南》第一次将古文一分为二,一为“四六”,一为散文。“四六”语本柳宗元“骈四偶六”之说,特指骈体文。骈体文排比对仗,形式工整,它的特点是“拘对”。至于散文,自古有之,泛指一切以散语行文的文章。

宋人这种散文观念一直沿袭到清代。清代人所谓的散文,一般也是指骈体文以外的一切散语行文的各体文章。但现代文章学家所称的散文则与古人明显不同。现代文章学家所谓的散文,有广、狭二义。狭义散文特指抒写怀抱、记人叙事一类的文艺性作品,而非非文艺性的作品诸如历史记叙文、科技说明文、公务应用文以及各种政论文、学术论文相区别。广义散文则与韵文相区别,举凡不拘韵对而以散语行文的文字,不论是文艺性的,还是非文艺性的,长制短制,都一概归之于散文之列。

笔者撰写这本书里所说的散文,指的是广义散文,而前人所讨论的骈、散之分,则不复为用,所以本书也包括骈体文(主要是论述古代散文部分)。因为骈体文虽然“四六”拘对,不可以说它是散语行文,但因其不拘韵律,难以把它归之于韵文。这样,不仅一切政令之文、哲理之文、史传之文、学术之文、应用之文都是本书所谓的散文;就是并不讲求声韵格律的文艺之文,也一并归之于本书的散文范畴。它包括了记叙文、抒情文、杂文、游记、随笔、速写、赋文、传记文学、报告文学、文艺通讯、科学作品等。

人们在使用散文这个名称之前,早就讲了几千年的散文。就有文字记录而言,散文一词上溯不过赵宋王朝,距今仅七百多年;可是我国的散文体文章却一直可以上溯到上古,殷商的甲骨文、西周的金文(铜鼎铭文),以及世代传下来的尚书,都是我国古代散文的源头,它们距今有近三千年乃至四千年的历史。

我国历史悠久,历代图书典籍浩如烟海。清朝官修《四库全书》,共收录经、史、子、集近八万卷,为世界之最,而其中大部分又为散文作品。所以,所谓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璀璨文化、伟大学术、优秀传统云云,也就主要蕴藏在丰富的散文之中。可以说,散文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宝贵遗产。

现在,我们还是回到散文的分类上吧。

对于散文,论述颇多,各有千秋,也尽显风采。郁达夫的归结就很有见地,他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指出:散文或散文家之深情远旨,在于贴近“散文之心”。按照郁达夫的说法,中国向来没有“散文”之名,现在所用,乃由翻译得来。名是一回事,实又是一回事。早在先秦时期,诸子散文就很发达,很有特色,加上史传、策论、墓志、随笔、信札等等,古代散文的分量确实不容低估。当然,也有论者言称,在中国文学史上,散文的三大勃兴时期:春秋、魏晋、“五四”,都是王纲解纽、偶像破坏时期。其实,郁达夫是赞成把散文的界限划得更宽广一些的。文学专家显然不会认同这种宽容的态度,所以才有“狭义散文”的说法。即使在这名目底下,式样也仍然很不少。要说散文特点,恐怕最简单的还是回到个人性上面。首先,在内容方面,散文更重个人经验和内心体验。生活劳作,读书旅行,都是关于个人或者由个人参与的。用学者、诗人林贤治的话说,散文更多的是表现社会制度的

细部变化,是情感、意识、态度的变化,是对世界的最实际的描写,最质朴的叙述,最由衷的咏叹。真正的散文是不戴面具的。

目下,关于散文的分类还是众说纷纭,令人眼花缭乱。笔者在此不议,仍当坚持自己的一个基本立场,就是回到文本中去。重视文本,并不等同于形式主义的文本分析。文本的重要性,在于它使我们撇开一切命令、禁忌和诱惑,专注于实质性研究,不但研究形式的因素,而且研究落在每一部分形式中的内容:思想、感情、人格、个性、时代、传统、现代,不仅仅是经由组织的意象和材料。重要的是精神指向。因此,文本分析应当是一种综合分析,不同角度和不同途径的分析,最终将通向综合。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在梳理二千余年的安康文学史中发现,安康从古至今散文创作的篇幅比重远大于其他文学种类,收获是相当重大的,其分类也是清晰可见的。

按方志通例,艺文志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艺文有志,始于班固《汉书》,为群籍之著录。至宋,方志始设艺文一门,后世沿袭,或称艺文志、艺文考、艺文略、文苑考等等,内容多为不同时期的文化成果。以现有的资料看,安康撰志始自清代,嗣后相继编有州志、府志、县志等。安康学院钮绪纯先生在《安康史志·艺文志的编撰体例及文化价值探析》(见《安康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一文中说,他查阅搜集到的有安康州、府、县志共17部,主要集中在清代前期和中期,即公元1688—1893年,时间跨度200余年,载录艺文984篇。据他调查发现,安康艺文志所保留的历史文献,多是正史和其他文献中所没有的,如乾隆四十年《汉阴县志》、康熙二十六年《石泉县志》、雍正十二年《旬阳县志》等,有很多内容国家图书馆也没有。由于安康自明代以来的州、府、县志因洪水的吞噬,几乎荡然无存,现存的各县县志大都为清代编撰,体例大同小异,最具代表性的当为康熙时期的《兴安州志》。它辑文述典,上始宋代,下迄明清,在安康地方史料中,内容最丰,体裁最广。

这里,为什么要论及安康史志中的艺文志呢?这就牵涉到了本节所述的“安康散文的种类与发展轨迹”这一主题。因为,安康的古代散文基本上是从艺文志中保留下来的。“艺文”者,“文学艺术、辞章之概称也”,是名可以涵盖所收录的篇目。

安康史志、艺文志的选编体例如同历史书,遵循“艺文一门,须以文学与艺术并重”的原则,以安康艺文活动形式及特征为主线,以诗、记、碑记、序为主,兼收楹联、传、疏、跋、赋、叙、杂文、逸事等。《兴安州志》(康熙三十四年)收文共138篇,只限于“记”与“诗”两种体裁,其中“记”37篇,“诗”101篇(首)。可见,安康当时的文学艺术活动形式当以“记”和诗歌为主,史志的选编自然以“记”和诗歌为干。在钮先生收集的17部安康县、州、府志中,辑录艺文共984篇,其中诗684篇(首),其他300篇就是记、序、碑记、疏、跋、赋、论、奏之类的散文了。史志的选编自然以“记”和诗歌为干。安康史志、艺文志选编的基本原则,其主体为诗歌和散文两大类了。

文各有体,中国古代的每一种文体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风格、基本程式和写作要求,文学创作必须遵循这些艺术规定,这是中国古代文体的基本理论。就安康古代散文而言,疏、议、序、跋、记、考、说、感、言、赋,统归其列。篇章皆短,言简意赅,写起来方便,读起来不厌其烦。安康文化学者、评论家田尔斯先生在论及安康古代散文时说:“(参见为李厚之、张会鉴、杨克编注的《安康历代散文作品选注》一书所作的序)古人作文遣句,很讲究抑扬顿挫,句式变化,推敲功夫用在文章之外。我们阅读时不能不细心一点。古人就很细心,观察事物细心,捕捉题材细心,落笔差墨细心。细心是文字优美的先决条件”。他认为,安康古代多数散文是“记”,记表示记事。记述与描写刻画不同,重在层次分明,有序而不乱,把眼前的物象或事件交代清楚就行了,间或插入一点精刻工描的局部细节,给人以具体的印象,防止过分浮泛。而“赋”这种文体,以铺排渲染见长,多用对偶和排比句式,注重藻饰,安康古代的散文明显表现出这些特点,作者的文笔足以适应那个时代安康社会生活的需要。

笔者通过查阅梳理《安康地区志》《安康县志》《安康县志校注》,过去号称安康十二县的各县县志,以及能收集到的安康古代散文篇章,从而发现,安康古代散文尽管胸襟气度、艺术手法上与经典性的六朝赋、唐宋文相比略差一等,但自有其真切之处、亲近之处、独特之处。

(连载之二)

激发乡土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梅越铭

环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子思想空前活跃,百家争鸣。法治作为一种独立的治世理念应运而生。春秋至秦,礼法分流。秦始皇通过商鞅变法建立起以法为核心的治世制度,至此法治取代了原本的礼治,成为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汉代汲取了秦朝短命而亡的教训,总结了周王朝绵延数百年的历史经验,倾向于恢复礼治。因秦法长期实践日益成熟,想要彻底放弃法治、全盘恢复礼治在汉朝当时不切实际,故汉代采取礼法融合的方法,以礼为魂,以法为制。汉中期以后礼法合一,统治者通过礼治来教化民众的内心,通过刑罚来规范民众的行为,通过二者的良性互动来维持统治。汉代以后,礼的精神与法的制度相融合并持续发展,历经三国、魏晋南北朝、隋,直到《唐律》颁布标志着礼法在我国已经融合,礼法合一的治世理念趋于成熟。中国古代社会“礼法之治”的发展联结,与陕西大地在历史时空中的人与事多有联结,这为我们理解陕西乡土社会提供了咀嚼不尽的精神食粮。

撰写《乡土中国》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指出: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乡土社会被称为“礼治社会”,系因其社会秩序的维持靠的不是国家的法律,而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即所谓的礼治。在文明有由来已久的陕西读书,做人,我耳濡目染乡规民约中的礼治。比如,逢年过节看到祖父、父辈不约而同地祭奠先祖、慰问尊亲属,重要场合讲礼数、规矩,与人相处怕失礼,熟人之间称兄道弟等等,无不展现“礼仪之邦”“皇天后土”的传统。“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让我在阅读中感同不已的这些话,在陕西乡土社会中随处可以找到实例。陕西愣娃不惹事,能担当、尊师重教的特点则是身边人活生生的,有温度也有力度的传统。历史发展证明,礼治

在教化民众和治理社会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礼治对于乡土社会的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当代陕西人要传承礼治这一优秀的治世理念,并不断改良与发展,使其与现代法治建设实现更高层次的融合。

礼作为历史渊源颇深的传统文化,应当在现代社会进行创新型转化、创造性发展,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毋庸讳言,陕西乡土文化留给我们的传统,在改革开放之初一度成为创新求变的包袱,文化大省未成思想新风先发振荡之地,与我们耽于传统、短于行动有关,与陕西乡土社会在悠久的历史、良好的地理环境中遥望春风有关,与我们没有及时、深入地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有关。

在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完成历史学博士后研究的郭继承老师,在中国政法大学的讲台上呼吁当代大学生“做建设者,做改革者,做推动者”“深谙传统文化的陕西人明晓千年礼治与现代法治融合共长的关系。西北政法大学的学者著文指出,重塑以礼为代表的乡村共同体,这样才可以为现代法治的传播提供思想动力。我们相信,礼治是陕西乡土社会目前乃至今后都要发扬光大的治世理念,我们要在发展中不断丰富扩展其内涵,使之与时代同行,为推动现代法治建设提供不竭的动力。我们要下功夫从乡村的基本单位入手,立足于家庭,重塑家风文明,倡导乡风文明。我们要下力气弘扬法治观念,合理有效、深入浅出地送法下乡,让法治下乡、开风气,启民智,为官不与民争利,为政者讲信修睦,法度有序。

生活在陕西乡土社会,我深知,自己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有故乡可回,有故乡愿意回,有故乡的文化和我一起走远方。而这切愿望不仅仅是我,也是我的父老乡亲,无数躬身亲炙陕西大地的乡党,从文化自信到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信念。

一剪刀,一喷壶,大寒料峭时,给我养的金弹子盆景修剪枯枝败叶。水雾喷出的一瞬间,消散了枝叶上的尘垢,亦涤荡了我内心的“尘埃”。

人都爱亲近自然,这在科学中也有解释,当我们身处大自然的幽静环境时血液中会释放内啡肽,这种神经递质可以减少疼痛,并带来轻微的愉悦。而今人们在车水马龙的街市、商品化的楼宇,逐渐远离了大自然,烦琐的生活耗费了人的能量。人们于是种养各种花卉盆景,模拟自然状态,装饰家园制作山水盆景、树桩盆景等,以此满足人们内心的那份需要。

山水盆景通常以各种山石为主要材料,经精细选择和加工造型,模仿真山真水的天然景色,让你于咫尺之间,感受到悬崖绝壁、幽岩邃谷等山水风光,观之犹如立体的山水画。置身于这种浓郁的自然山水盆景氛围中,可得悠然自适、淡泊宁静的境界。然而,此类盆景养护起来十分不便,所以接受的人群很有限。

相对而言,树桩盆景养护起来比较容易,其常以木本植物为制作材料,山石、人物、鸟兽等作陪衬,通过蟠扎造型、修剪、养年功等方法进行长期的艺术加工和园艺栽培,在盆钵中表现巨木葱茏的景象。山采的树桩由于截去了部分根和全部的枝叶需要重新栽植,当桩体长出枝条在适当的时候需要对桩枝进行蟠扎、修剪,初见桩枝满是铝线缠绕,看似铝线规矩矩的束缚了其自然生长,实则则是为了塑造其型,使其成为可赏之景。

纵观人的一生也是在接受规矩的束缚,寻常百姓之家,坐、立、站皆有规矩,帝王贵胄头戴冕旒,一方面是彰显其威严,另一方面是对言行举止有贵戚规范作用。因为,冕旒前后的玉珠很容易晃动并发出声响,无论说话时的动作还是走路甚至坐姿都要端庄稳重,若动作幅度太大走路太急,就会被打脸;如坐姿不正,头歪身斜则冕旒滑落。如此,佩戴者就会逐渐养成抬头挺胸大气威严的气派。《韩非子·解老》有云:“万物莫不有规矩。”大方之家,长幼有序,为人礼数,把握规矩;大国工匠卯榫技术严丝合缝,皆有尺度。懂得用规矩自我束缚,守住规矩,和守规矩的人在一起,才能守住人生。

如果说修剪、铝线缠绕束缚了桩体自然成长,那么放养过渡就是给树桩盆景充分生长的机会。方寸大小的树桩盆景,枝干由粗到细的过程需要有接近自然的过渡。盆景的一级过渡、二级过渡,对盆景来说十分重要,亦如盖房之基础,养好过渡既可弥补桩体本身的不足,也可使桩体看上去协调,起到瑕不掩瑜的效果,形成自然美感。

岁月更替,不可骤得,养景养根,亦养人心,人如盆景,方寸之间,唯有沐雨经霜,才有有翩若惊鸿之姿抑或是虬枝龙爪之态。过程虽苦,终有回甘。

一枝一叶一方景

李壬午